

略论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

黄南珊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 深入阐释了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内容建构和精神要点。指出, 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 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向引导, 它的精神实质和文化方法论, 经过历史考验而显示出理性的生命力, 并且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所继承、坚持和发展。

关键词: 毛泽东; 文化建设思想; 精神实质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领导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 就其内容构成和发展形态而言, 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构范式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构范式

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纲领的理论形态和具体内涵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阐发。

第一, 关于建立民族新文化的目的

毛泽东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致力于实现“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致力于实现文化上“文明先进”的中国。实现文化上的“文明先进”, 正是文化纲领的目标要求。“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

第二, 关于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依据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文化形态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 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1]。中华民族新文化同“资本主义新经济”相联系, “没有资本主义新经济”, “所谓新文化, 是无从发生的”^[1]。这就指明了新文化与新经济的耦合关系。

第三, 关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和内容

民族新文化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同

一, “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它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从内容实质来看,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句话,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 其思想特色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

第四, 关于民族新文化与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 “新的文化力量”也是“中国的革命力量”^[1]。“革命文化, 对于人民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 在革命前, 是革命的思想准备; 在革命中, 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从革命对象来看, 新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及其反动同盟的^[1]。

第五, 关于民族新文化的基本特征

新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一, 是民族性特征。它包括两点: 首先是民族革命斗争服务; 其次是新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其二, 是科学性特征。它包括两点: 首先是民主革命斗争服务; 其次是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强调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其三, 是大众性特征。它包括两点: 首先就服务对象来说, 作为大众文化, 它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其次就方法论来说, 要求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毛泽东站在现代理论思维的新高度, 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科学地解答了文化范式的现代转型问题。这一文化纲领所标示的文化革命主义, 一是体现于文化服务论。强调新文化对民主革命的从属关系和服务功能, 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

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1]。二是體現於文化爭論。強調新文化對舊文化的批判作用和鬥爭品格。這種新舊文化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1]，突出大破大立的變革機制。三是文化特色論。即走民族化道路，強調“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民族的形式”的有機統一，突出“民族特性”和“中國氣派”，維護了民族文化形式的獨立性和完整性。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突出了民族新文化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主義的思想特色，克服了唯文化論的傳統價值取向，超越了體用二分的傳統思維模式。它致力於文化範式的現代轉型，其在指導思想和價值選擇上確保了新文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它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綱領所提供的理論啟示，主要表現為三點：一是在理論建構框架上標示經濟綱領、政治綱領和文化綱領的“三分法”；二是新文化的三個基本特徵（“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直接成為初級階段文化建設綱領的構成維度；三是在文化學方法上，繼承、借鑒、創造的有機統一直接成為初級階段文化建設綱領對待古今中外文化關係的方法論依據。

二、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思想

建國後，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論轉變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注重於建設性新思維。他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2]他對“思想文化建設”問題高度重視，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方針原則，領導制定了一系列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長遠規劃。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包括下列要點：

第一，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建國以後，隨著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的確立，在文化的方向問題上，已由民主革命時期的文化為革命服務轉向文化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2]與此相應，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就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文化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為宗旨和以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為服務方向。由此可知，毛澤東規定了文化應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在文藝的方向問題上，則堅持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並且沿用“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3]。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及其思維定勢和運作方式被推向極端和畸化，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效應。因而在新時

期，鄧小平在將“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重申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並主張“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4]。毛澤東一貫強調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建設的指導作用和強調文化建設的關鍵在於黨的領導。

第二，以“高度現代文化”為目標要求

毛澤東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2]，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高度現代文化”（或“高度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時期文化建設的目標要求。這種現代文化，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是不言而喻的），又具有現代性特徵。從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認識來看，毛澤東分別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把“現代科學文化”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現代科學文化”即是“科學文化現代化”^[5]。毛澤東認為，“發展我們的文化”^[2]，是建立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基礎上的，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是相互促進、耦合發展的。離開了經濟建設，現代文化就缺乏堅實的基础。因此，他用“一窮二白”來形容經濟上文化上的落後，用“富裕、強盛”和“高度文化”作為經濟和文化的发展目標。

第三，高度重視發展科學技術

在毛澤東看來，文化建設包括發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業，科學技術是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他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先導作用和關鍵地位，強調現代化建設要依靠科技進步。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認為“要打科學技術這一仗，不打好這一仗，生產力無法提高”^[6]。他向全國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要求“完成這個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技術革命”。他還從戰略決策的高度提出實現技術革命的歷史任務，指明“所謂建設，也是技術革命”，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6]。在過渡時期，毛澤東一方面要求“技術革命”（或“技術改革”）與“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這“兩種革命”兼顧並舉，另一方面要求“技術革命”（指科技事業）與“文化革命”（指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影等文化事業）這兩類事業協調發展。毛澤東還指出，向科學進軍，開展技術革命，要確立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堅持實事求是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深刻認識和掌握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

第四，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雙百”方針是毛澤東根據國家文化建設的迫切需

要而提出的根本指导方针。他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主张“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2]。“双百”方针作为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指导方针,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2],为全面繁荣科学文化提供了方针保障,贯彻“双百”方针,成为正确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无禁区,要充分尊重学术民主和允许自由争鸣,而且强调指出,科学研究要着眼于创新,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范围内,自然界和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只有认识和掌握科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

第五,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法原则

文化建设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认识方法。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法,着眼于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吸收其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化成分,反对毫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对于外来文化,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法,着眼于批判性地借鉴和利用,吸收其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化成分,反对盲目崇拜或一概排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是由《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精华糟粕论”发展而来^[1],两者内在精神一致,即都强调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精神和辩证分析方法。推陈出新的方法原则着重于创新思维,正是抓住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这种文化创新建构范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有机统一^[2]。毛泽东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不要全盘西化”而“要中国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法,精神实质就是辩证扬弃,综合创新。这一文化认识方法,正确处理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把“继承”、“借鉴”、“创造”有机统一起来了。

第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不能放松或削弱。从功能论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现代化建设起着方向保证和思想保障作用。毛泽东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

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他多次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2],经常向群众进行生动、切实的政治教育,充分调动和发挥一切积极性。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思想认识问题,精神世界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科学与愚昧的矛盾关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要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艺术水平,摒弃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只有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和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才能收到成效,达到教育目的。

第七,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建设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贯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他所倡导的延安精神,在思想道德方面,包含了为共产主义自觉献身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即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和延安整风精神的整合体现)。建国后,毛泽东在要求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他大力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倡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国情教育,提倡加强思想改造和转变世界观,提倡要有一股革命热情、一种拼命精神,提倡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他所树立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光辉典型形象,从不同维度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非常重视理想信念、精神品德、优良传统的作用,要求用崇高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激励人民群众。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倡导下,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良好道德风尚,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在全社会得到了大发扬。

由上可知,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目标要求、指导方针、方法原则、主体内容等作了精要的论述。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其文化建设思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背离而没有贯彻到底,甚至导致当代文化建设的严重失误。这种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从文化建设本体来看,由于“左”的指导思想

上的影响而导致文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论”和“全面专政论”被引入思想文化领域,使这一领域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史无前例”的政治批判和残酷斗争,导致大革文化的命的恶果。与那种“左”的指导思想相对应,在运作方式上则采用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方式和“四大”方法来代替学术争鸣和思想教育,陷入畸化的批判运动怪圈。第二,从文化建设主体来看,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而导致知识分子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即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属性上不属于工人阶级,致使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情势下,从“团结”、“改造”的对象沦为“批判”、“专政”的对象,逃不出“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魔障。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地破坏了人才队伍建设。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曾作了精辟论述。列宁曾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概括为“文化革命”,其主要内容

包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等。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正确方向。它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及其文化方法论,经过历史的考验而显示出理性的生命力,并且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所直接继承、坚持和发展,熔铸在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江泽民的文化建设纲领之中。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于华东)

(上接第55页) 他借游山引发人生感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要想达到这个境地,就必须“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这无疑是作者身心投入自然而悟出的,它表现出作者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沈括是爱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的科学家。他任官外巡期间,总不忘对自然物貌进行实地考察,如由雁荡山等地形地理认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石中的生物遗迹推知冲积平原的形成过程等。沈括已经不是单纯的借自然来陶冶性情,而是自觉地去审视自然、探寻物理。由于他的这种努力,使中国古代的地质学研究在世界地质学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宋代文人中,既能借自然以陶冶性情,实现精神的超越,又能从自然中感悟事理,阐发事物规律的,苏轼是突出的一位。他的《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写出了他对庐山风光奇异无比的惊叹,而且借观赏庐山道出了一个哲理:人们看问题要全面而不要片面,要客观而不要主观臆断。他的《石钟山记》,写于由黄州徙汝州的途中,是他一生中最困苦之时,然而他还能身临其境,对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辨明石钟山得名之由来,并从中悟出一个通理:对任何事物作判断,必须“目见耳闻”,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物真相,而

不可主观“臆断其有无”。这种征实致知的精神,无疑与其对自然的热爱和崇尚有关。

四、余 论

两宋文人放情山水乐其所乐,最直接的意义是产生了一大批吟咏山水佳作。这些作品在题材和艺术方面对宋以前的同类作品有所借鉴,更有所突破。综观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作者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赏心悦目中用心去感悟自然的美丽,进而把自己和自然化而为一。这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说:“山水之乐,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那么谁能得山水之乐呢?“乐者不得,得者不乐;贪者不与,廉者不夺也。故人与山水两相求而不相遭。”(杨万里《景延楼记》)两宋文人大多就是这样一些身处困境而志洁品高,“与山水两相求而不相遭”的清廉之士,所以他们一旦投身自然,是多么倾心而忘情!

总体而言,两宋文人的山水作品,是一批宝贵的艺术财富,它们给后世以殷殷滋养,使人既能获得美感享受,又能接受爱我河山的情感熏陶和探求哲理的理智启迪,多读常读,何乐不为?

(责任编辑 于华东)